

懸崖邊的野地

威海小兒野放累盡返回組合屋時，手指頭遙指著一條虛擬的線條說：「我們的家已經變成公園了！」

「我們的家」是威海記憶裡的學校日式宿舍，沿著路邊石階下落，左側一株曇花樹，曇花曾經開出朵大的白花，據稱佐以冰糖熬煮冰鎮味道相當迷人，我不曾試過，何況它已經美人般殞落。

□震前，記憶的光影

宿舍計四塊隔間，三塊空間擺放沉重的書籍，一家人於是侷促的活著，日後新闢一座鐵皮屋權充工作室與廚房，整座屋宇的左邊是菜園與李子果園，紅露李與黃露李結果的季節，果肉的香味吸引了遊蕩在山崖邊的潑猴，經常趁人類上學的時節偷偷摘取，好像牠們也來果園上課一般。鐵皮屋的後背空間是我招待親朋好友的烤肉區，我其實最喜歡在接近傍晚的放學時刻坐臥在此處，手上也許是一本切·格瓦拉的《摩托車南美洲之旅》的薄薄書冊，在你想像著游擊戰士格瓦拉返回委內瑞拉的叢林裡也是閱讀著聶魯達詩集的同時，幾片直昇機螺旋槳般的李花墜落下來，你覺得日子是可以這樣簡單而富足的生活著。可是我兒威海那一條虛擬的線條說明了這一座簡單而富足的生活空間在剎那間消失殆盡，只留下斑駁著晃動的光影供記憶艱困的倒帶，而我們僅只是時間驚腳的放映師。

順著部落那條筆直的康莊大道而下，左手邊是錯亂林立的房舍，右手邊先是記憶中的宿舍而今規劃成幼稚園孩童的木馬遊樂區，三匹木馬已經讓孩童折磨的很疲倦了，菜園的方向鋪著菱形地磚，已經不是飛越籬笆的無懼的雞隻而是更為巨大壯觀的鐵網圍成的籃球場，緊接著是尚未遷移的世界展望會兩棟組合屋有如雙胞胎，在整座長條狀的休閒公園裡它們還不是最為錯愕的景象，那應該是下一座廢棄的組合屋，今年寒冬過年前為火舌舔噬殆盡，只留下餘灰殘跡印證黑夜魅影之火如何凌虐孤苦的家庭。

□十字架，也墜入河谷

爾後是賞心悅目的步道區，挑高透空的視野可以讓眼睛延伸到卓蘭鎮，天氣好的時候，鐵砧山像一粒啤酒瓶蓋；地震後墜落河谷的天主教堂已經換置成整齊劃一的停車場，自然現在也聽不到週日禮拜鐘聲，好像天使的翅膀也隨著大安溪奔流到海不復還。視線抵達消失的教堂後，我通常就要放慢腳步，因為規劃的帶狀公園至此戛然而止，我的視線像溫柔的羽翼滑了過去，這是一塊讓遊客感覺莫名所以的野地，也是我地震前一個月付清尾款購得的聖母瑪麗亞保佑的土地，它

現在看起來已經像是歷經「十誠」之後的畸零迦南地，這塊土地與天主教堂一同墜落河谷，只留下一十幾坪箭頭一般的形狀，似乎是瞄準了我的心臟發射。我曾經戲謔的對著友人說要到城市購買 H 鋼管將散落的土塊撐架起來，然後跳著猛男鋼管舞募錢重建，但你知道的，這只是充滿悲憐之情的黑色幽默獨幕劇。

一九九四年從豐原衛星城市返回部落任教，有一個催促的力量其實是來自於全球性的「國際原住民年」，那個時候，散落在台灣各地的原住民小知識份子受到了感染，我也躬逢其盛，在往來於首善之都與衛星城市寓室之間，衝折於原住民運動與知識良心之間，我和我們的原住民朋友企圖以實踐的力度「重返部落」，這一塊「懸崖邊的野地」就成爲個人實踐的夢土——一座人民理想的圖書館，一座解殖民的知識基地，一座族人與全球的互聯網絡。每次有外地的朋友來到部落，我總是先將他們帶到昔日理蕃道路的制高點，將部落放大到眼睛清晰的辨認巷道的程度，然後在觀音溪谷上方的空氣裡也是用熱情的手指頭描繪著理想的藍圖——族人穿梭在知識的城堡；廓清舊有而荒廢的環山水道，讓流水貫穿一座小而美的部落；可以看到菱形織布張掛成窗簾……

□土地的邀請

「九二一」第二日，父親不管還在震動的地殼仍舊越過凹凸斷續的林道前往果園勘查，那是一處父親自林務局租用的山坡地，記得還是五、六歲白馬般的年齡，父親墾荒整地初初播種的春天時節，就在以幾根木頭撐起的簡陋工寮外，父親指著坡地而上說：「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土地即便在當時充滿著盤結錯生的高大樹叢、四腳無腳爬蟲鑽動不息、更不要提山豬猴群爭搶根莖果實，父親的確以這座惡地形般的土地供養一家人。這土地充滿著惡鬥、艱苦、勞力與智慧雜揉的歷史，於是當父親眼見曾經如巨人般的果園殘破成被肢解般的屍塊，一時間僅能愕然哭坐地上一日，父親日後述說那一段經歷時，在我腦海的影像放映著一位老人的哭山之旅。

隔年桃芝颱風又挑上地震前不斷參加文學獎獲致的獎金爲父親購買的屬於自己的土地（父親自幼即是孤兒，退伍成人之後從來沒有自己的土地），父親在部落東北角山腳下的土地闢成大家都流行的甜柿園，首度面臨收成的這一年父親顯得既緊張又興奮，那天早晨天露濛雨，父親已到甜柿園耕種打算施肥，但是天不從人願，濛濛的雨抹在臉上逐漸轉換成老天的鞭子，於是返回工寮思索未來之日，有一顆小石頭不合時宜的驚動了父親的想像，父親走出工寮，在雨鞭裡辨識小石頭的出處，「這座山爲什麼像是在走路？」父親在組合屋進行口述歷史時發出了疑問。果然這座山不只是在走路，還走的很急躁；等到第二批山石滾落下來，父親絕望的退到小山頂，這回不是哭山，父親說：「比大螢幕身歷聲電影還要精采感人動人心魄哩！」觀賞一個下午的土石流，最後父親的結論是：以後可以不用在做山了。

我想我的父親與花了一世在土地上奮鬥的族人一般，他們首次驚異於土地的

不可信賴，地會動，山會走，土石也可以是流水，那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爲什麼要窮盡一輩子的力量與不可知的世界搏鬥呢？我的母親卻沒有這麼多不安的想像，就在帶狀公園的尾端那一處地震垮落的「懸崖邊的土地」，也不見母親有任何慾望的隨心所意似地播種些什麼，雜草與蔬果同歡，樹豆與灌木互有領域，有時候是幾隻精銳的雞覓啄昆蟲，我問母親這塊地打算種些什麼？母親說：「土地太累了，讓它休息，不要打擾它，有一天，土地就會邀請你進來。」

也許有一天我兒威海會說：「我們的家已經變成野地了！」這有何不可，這表示土地願意邀請我們住進去了，不是嗎？

東勢林場有座後花園

旅遊的轎車滑過東勢大橋之後，通常有兩個選擇，一是右轉直奔中部橫貫公路沿著大甲溪抵谷關，谷關冒有白色熱氣的溫泉，Kulas(古拉斯)部落稱谷關叫U-lai；另一個選擇是直取北向，經過兩岸扶疏的花木果樹，臨近大安溪之後，譽為「中部陽明山」的東勢林場就闖進你的眼簾。

現在，你可以有第三個選擇了！

它隱藏在東勢林場後方的山谷，就像一座由東向西擺好的太師椅，正邀請疲憊的旅人坐下，你可以吹著山林的氣息，拂去塵世的灰燼。

「九二一大地震」被地牛整的很慘的雙崎部落，你想不到過了三年它會是你進入東勢之後的第三個選擇。

四年前的記者從卓蘭的方向往東面望去時，部落的台地宛如被一隻無形的手刻意的截掉一段，隔日的新聞版面稱之為「上帝之手」。至於東面的八雅鞍部山脈，它們震露出剛強的石壁，將土黃的泥土推出山的骨架，也將等待收穫的日本甜柿摔落山谷，許多部落的果農尋到山上，有的甜柿園掉了股價般的換成賤價的梅子園，甜柿園早溜到下方河谷，讓部落的長老哭笑不得，臉上的紋路也新闢了幾道河川。

地震之後，部落一批族人來到新社十軍團避難，這成為部落分裂的肇因。留在部落的族人認為這批人棄離了祖先之地；在十軍團避難的族人卻也認為留駐部落的族人失去了同族之心，每次回部落時賑災物品都不給一些。聖誕夜，組合屋在扶輪社的協助下蓋成，二十二戶十軍團的棄民回來了，他們帶著物資禮物分發到部落各家並唱起聖歌，希望獲得諒解，情況其實並沒有好轉，斷水、缺糧、冷眼、排擠依然延續到第二年聖誕節。

部落的空氣新鮮甜美依舊，只是增加了猜忌與憤恨的情緒；遠山逐漸蒼翠，人心卻逐漸冷漠。工作團隊不願進駐部落、部落成為縣府黑名單，當其他的部落逐漸走出自己的腳步時，雙崎仍然快意於莫名的恩仇，穿越部落的道路經常上演「紐約那條黑街」；大安溪沿線的族人稱雙崎部落是個「一把沙子」時，部落中生代與年輕人的耳朵好像塞進了尖銳的石頭，心臟的位置成為其他部落訕笑的靶子，「將手握在一起吧！」有人痛苦的呼出了聲音。

第三年，以部落中生代為名義的運動會正式登場，地震後首次讓大家摒除心結，首次願意一同流汗、一同歡笑、一同競賽，這麼多的「大家一起來」逐漸讓部落找到了可以努力的方向。教會發動道路鋤草公共服務、籃球場再度出現運動的青少年、組合屋協力接換水管……公家機關心完成了建築、新社區動工、社區公園逐日完工，這些都讓部落有了新的面貌，但是部落的下一步該怎麼走？依然是巨大的挑戰！

幾個小型的聚會讓意念和思慮衝折，「團結吧！」這哀告的呼聲困窘的迴盪在仍然讓人迷惑的室內，有人取出獨自苦思的「部落發展意像圖」，像哥倫布發

現新大陸，族人看到了自己久棄的土地竟然還艱苦的挺著，瘦弱的河川要保育、日據時期水道要復建、家屋四周要庭園化，有人說，「讓我們的孩子打球才不會打電動遊戲機」……就是這些思慮與意念，淬發出『雙崎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的誕生。這已經是第四年的事了。

這一年，我們才有足夠的智慧握手。我想起老人家告訴我關於巨人哈路斯的故事，故事說哈路斯力大無比，走起路來呼風喚雨、天搖地動，喜歡將 U-tas 架在大雨過後的溪流當橋面，女人安然渡過，男人卻失足墜落；平日依恃身強體壯好吃懶做，偷取或強取族人獵獲，最可惱的是不時調戲女人，族人在忍無可忍之際，同心協力用計殺死哈路斯。

口傳中的哈路斯其實是地震的化身，原來殺死哈路斯是要經過一番波折的，而智慧、勇氣、團結才是維繫部落的根柢。我想我們開始觸摸到這些根柢了。

週六日的部落，或有遊山玩水的外地人經過雙崎部落，在新建的長條狀道路公園，遊客總要驚呼眼前的景緻，建議你在陽光放軟的午後停下來，大安溪寬闊的河谷會敞開你的心靈，翠綠的山谷將擦亮你的眼睛，當然，嬉戲的孩童和恬靜的部落將溫暖你紛亂的心靈，將這些帶回家，你會記得我說過：東勢林場有座後花園！

災後重建的基礎思考

六月二十四日，媒體記者的鎂光燈錯落在李遠哲、黃榮村等「九二一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參加南投縣埔里重建會議時，肯定也會驚訝於會中幾個老生常談的重建議題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出，「老生常談」意味著重建議題的重建議題的延宕難解，幾令人有束手無策之感，它事實上反映了政府的無能與民間的無力這雙重狀態。

災後重建已經過了九個月，如果結果是這樣，不免還是讓人錯愕與憤怒。同一天在台中縣政府，由全盟原住民工作小組與小米釀工房邀集原住民災區十個工作團隊舉辦的「原住民災區與新主委——與尤哈尼的對話」顯然未獲媒體青睞。然原民會主委率工作團隊所表現出的誠意與虛心就教的態度，以及原住民災區工作站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使官方與民間對災區重建工作有了初步合作的基礎，特別是會中討論的幾個重建的基礎思考，很值得在此提供給大家做進一步的討論。

一、阻斷公共工程政商合謀模式：

以往鄉政公所公共工程發包，通常是府會（民意代表）合作、政商（而民意代表往常就是工程公司顧問或是負責人）合謀的結果。因此已道路工程的修建為例，工程完工後政商念茲在茲的不是道路暢通、永續發展，而是寄望一場大雨或是土石流再一次沖毀路面，以便進行再一次的承包工程。這當然是舊政府以地方工程操控基層民代的結果，因此災後公共工程的重建方向應朝向工程在地化與訂定災區工程進用在地住民的最低比例，以遏阻以往的弊病。

二、重建工作在地化與保障工作權：

九二一災後的原住民地區，因道路阻斷、山崩地塌、土石流與果園崩毀，復以外勞搶站都市粗級勞動工作，災區原住民的工作權遭到雙重以上的扼殺，造成的結果是，無法保障工作環境與工作權，重建家園勢必遙遙無期。因此，重建工

作與災區原住民人力的結合，一方面是保障工作權，也是重建家園的一條進路。一方面則以在地工作凝聚愛家愛鄉的社區營造精神。換言之，全面檢討現有「以工代賑」工作項目與內容，結合災區人力需求以進行重建工作是思考的重點。另一個是重新檢討原住民地區公營機構（如林務局、電力公司、國家公園等）釋出工作機會。

三、建立民主、有效的監督機制：

重建工作九個月來，由於中央將重建機制下放到少有自治能力的鄉鎮公所，縣市政府無法干預重建工作，僅能是福利式支援災區工作，造成頭痛醫頭鋸箭式重建模式，更重要的是，重建工作的項目、內容、時間表缺乏透明，不但使在地工作組織無法有意見暢通的路徑，也容易造成鄉鎮重建委員會寡頭政治的決策模式，事實證明，由各鄉所提出的重建規劃內涵來看，缺乏在地化、社區總體營造精神、以經濟利益為導向以及重硬體輕軟體等弊病重現。真正可怕的是，九個多月的重建工作是在一個不用監督的政治空間下進行的，換句話說，是不用擔心重建工作做的好不好、有無弊病、有無瀆職的超安全工作模式。因此，提出重建工作項目、內容、執行單位的時間表，是讓重建工作納入監督管制的機制；提出地方組織與鄉鎮重建委員會對話的空間，是讓重建工作納入民主討論與有效反映的重建機制。以上的觀察得知，新政府「九二一重建推動委員會」刻正首要解決的是，舊政府遺留下來的政商合謀舊思維；而如何讓重建工作的力量重新掌握在人民手裡，透過民主協商的討論、社區營造精神的重鑄，政府扮演積極支援的角色，在公共工程上主動修護重建，納入在地思考，如此才有可能落實各項災後重建工作。

里錫河谷與社區重建

古老的印度擁有燦爛的宗教與互谷的文化，年輕的印度卻經歷著多次的暴動與猖獗的瘟疫。今日的印度被形容為原始與現代並存的世界。水源短缺與人口的壓力，使得印度恰恰印證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人口若未加以抑制，將會以等比級數的速度增加，而食物的供應則只是以等級差數的速度增加。因此，必須透過戰爭、疾病、經濟蕭條或任何理由，來抑制人口。

印度西南邊的里錫河谷卻改變了馬爾薩斯所描繪的印度。幾十年前，這原是一座常年乾旱的區域，他們並沒有接受任何一位西方專家的忠告，也幾乎沒有靠外面的資金，居民們卻找出了解決人口過剩和環境惡化的方案，整個河谷重建的秘密早就埋在居民腳下的土地，那是長久以來積累的人文的技藝（記憶）。

第一個秘密是恢復以往在發展口號下被戕害的生態環境，他們從學校著手，將環境保護當成課程的一個基本部分，由學生與村民一起靠雙手勞動，這個信念是立基於一個簡單而經常讓科層官僚忽視的原則：現代化的關鍵不是城市，而是村莊。如果一個國家的村莊還是很古舊，這個國家就不可能現代化。里錫河谷的學童每年種植適合當地地文的本土植物和灌木，並且分配十萬株幼苗在河谷中。因為，以發展為主導的綠色革命，在過分灌溉與過分使用人工肥料的後果是，耗竭了環境地基。

第二個秘密是圍繞著在地人文與環境為主體的教育體制，質言之，教育的中心由近而遠、透過觀察與實作，一層一層的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正如里錫河谷校區的學校，都成為村莊的中樞，傍晚時分舉辦成人識字、土地墾植、再造林、衛生保健、養蜂等依據在地產業需求的課程。這時候，兒童們就會協助父母去照顧學校的花園和植物苗圃，並建築沿等高線的堤岸和抑制水壩來防止侵蝕土地。主導這種革命教育的勞氏夫婦重新創造了學校的定義：教室是理想家庭的延伸，花園也是教室的延伸。每一個衛星學校都有一個種植花卉、水果和青菜的苗圃，由學生和他們的父母負責。更重要的是，學生必須時時紀錄植物的成長——這是一種美德的培養。換句話說，這是個讓孩子自己教自己的教育，教師只是協助者

的角色。

不論是環境保護、教育、知識傳承以及產業發展，里錫河谷的居民自信地表示：「一個社會必須要能自己發現事情，即使那些事情外人已經知道了。這樣一來，這些事情才能透過經驗而固定下來，並且深植在當地的想法裡。」里錫河谷成功的改變惡劣的環境與自身處境的理念，正是國家官僚與專家學者不願承認的權力下放——如果希望可以實現，那麼解決的方案必須在當地出現。希望和解決方案無法由幾千哩外的大政府或國際官僚進口而來。

閱讀著『世界的盡頭』這本描述西非以至東南亞第三世界國家的旅遊社會觀察書籍，里錫河谷的章節實證了在地人民的智慧與力量是不可忽視的，即使是屬於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度。這讓我反身思考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以及刻正重建的災區社區，國家官僚與專家是不是設計、安排、計劃了過多標準化而且是遠來和尚念經的營造與重建，在地人民是不是過分的仰賴這些標準化程序使得在地技藝因而喪失了？里錫河谷的事例或許為我們打開了一條社區重建的進路，但是，有個長久沉睡的心結要解開——我們是否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即便是災區的災民！

知識或者姿勢

聯合國臨時原住民工作小組於「一九九三國際原住民年」籌設一個10年的計畫，希望讓全球各國境內的原住民處境得以改善，特別是關注於原住民自決權、土地權、文化自主等相關的權利事項。中華民國政府也在1994年舉辦了第1屆的「全國原住民文化會議」，會議過程由原住民知識菁英發起的文化抗爭，則表達了不再甘於由外部族群所構築的文化霸權代替發言而強調對話，特別是與人類學、社會科學知識菁英群的對話。台灣外部的文化介入，以全球化與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最令人怵目驚心。

質言之，台灣東部產業的東移刻正影響著住民的生存環境，產業、旅遊、民族文化一一納編資本化的範疇，也使得原住民不得不隨著資本生產的方式起舞，它們一方面進行快速消費的行為模式，一方面消蝕著原住民在地文化，或者是壓縮、鑄模、規格著原住民文化用以方便消費。在此情況下的原住民知識分子所生產的知識論述就不能不令人格外關注。

從台灣內部觀察，隨著政治局面的政權交替、台灣社會鼓動的四大族群和諧說、多元文化的引進，再再誘引著台灣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導向泛社會運動爭取社會福利的模式，或者是，進入政府各個層級的「原民會」進行所謂的「體制內抗爭」。加以阿扁新政府宣示「新的伙伴關係」急欲在任內達成具有族群安撫指標的「自治事業」，又再一次逗引著原住民（特別是知識菁英）朝向新的權力競技場。另外有一群高瞻遠矚的原住民知識分子則進入學術殿堂，一則僭用殖民主的語彙進行文化抗爭，一則汲取殖民主文化養分建構自我的論述。凡此種種，我們都看到了原住民知識菁英如何在新社會、新形勢站穩知識場域的慾望，這不能不說是對台灣社會文化霸權的抵抗，但也不能不充斥著弔詭的陷阱。

今年起的「自治」議題尤為張目。先是達悟族與阿里山鄒族籌議自治，接著由中央原民會積極推動自治事業，在全省各鄉鎮舉辦自治議題座談會，緊接著有行政院原民會與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國際人權與原住民權益——台灣原住民族運動回顧」（12月9，10日），名為運動回顧，實則牽涉自治議題，

另有泰雅族民族議會籌備會亦將在下周正式成立，也是打著「自治」的旗號進軍台灣社會論壇。

情況似乎極為熱絡，但這總是政治上層與知識分子的領域，常民的原住民部落是否就此議題進行廣泛的討論與認知，實有商榷的地方。也就是說，目前的自治議題其實是由阿扁新政府與原住民知識菁英所慾望的圖像，進行知識的建構與行政的建構，它的陷阱一在於由國家推動的自治事業即便是完成自治規劃，並且邀請原住民進入自治實體，通常的結局是參養了一批依賴社會福利救濟的邊緣人。原住民也許可以在較好的社會福利制度下生活，但總是會遭受到優勢民族真實的輕視。當然這是最壞的狀況。

第二種陷阱恰恰是原住民知識菁英的知識生產是在一個沒有敵人的快樂處境下生產的（事實上並非沒有敵人，而是在政權轉變的過程中，原運失去了敵人的焦點），正如標舉著「體制內抗爭」的知識菁英，企圖以體制內資源進行原運的再分配，實際上卻掉入權力（位置、論述）爭奪的鬥爭中。第三，也正是新政府與知識菁英的共謀，知識的生產從來就不是經過部落自行組織的再教育與結盟，知識的生產從來就不是用以建構民族集體記憶和文化的復建為本，相反的，知識的生產正好是集結志同道合的菁英組構出一組文化霸權。套用薩伊德的話語，後殖論述假如不再踐行，後殖論述永遠只是權力菁英鬥爭的話語。後殖論述在於提升生命和促進自由為標的，一個缺乏踐行的論述（譬如自治），知識將只是姿勢，它也是追逐權力慾望的知識分子的姿態。

原住民知識分子，你選擇哪一種知識（姿勢）？